

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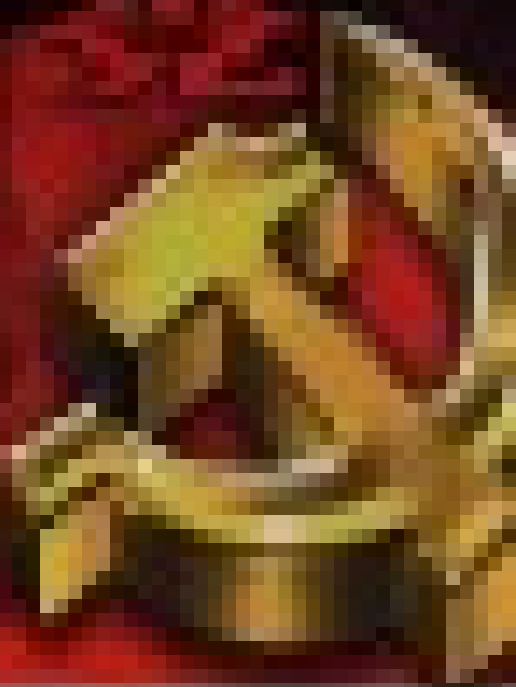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编

重大历史 评价问题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重大历史问题

讲介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第三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40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20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20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

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 1977~1978 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 50 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 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 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 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 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 1958 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 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 80 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 1956 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

社会主义党史前篇

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以上所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究竟是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1956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1959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1957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1959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1959~1960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

社会主义党史前篇

煽起了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 10 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

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 40 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 1949~1956 年的中国,特别是 1979~1989 年的中国。1979~1989 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 20 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胡乔木)

准确理解邓小平所说的“耽误了 20 年”

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回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走过道路时,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自己还耽误了 20 年”。这里主要是指在 20 年的时间里党的事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前进的步伐受到严重的干扰。正确理解邓小平的谈话,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20 年”的时间界定

党史研究一般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1949~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6~1966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又称“前十年”);1966~1976 年“文革”时期;1976 年以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的同志据此误以为邓小平所说的“20 年”是指“文革”十年和“文革”前十年的 20 年。其实这里所说的“20 年”,指的是 1958 年至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20 年。关于这个时间界定,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说:“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整整 20 年里,……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987 年 6 月 12 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科罗舍茨时,邓小平再次指出:“中国社会从 1958 年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这里,邓小平很清楚地把 1958 年到 1978 年的 20 年专门提出来,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

邓小平把“20 年”的上限界定到 1958 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左”倾错误实际上在 1957 年反右扩大化中就表现出来,但这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到了 1958 年情况就不同了,如邓小平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20 年”的下限定到 1978 年,“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为什么要专门提出“20 年”

邓小平把 1958 年到 1978 年的 20 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有两方面的意义:

社会主义党史前篇

其一是提醒人们高度注意“左”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的长期性、顽固性和危害性。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了国民经济巨大损失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从“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文革”十年实际上是经济停滞发展的十年。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国民收入至少损失了5000亿元。1976年粉碎“四人帮”,但是党仍在“左”的阴影下徘徊了两年,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如果用这20年同邻国日本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很大差距。1957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07亿美元,跟我国差不多,而到1978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713亿美元,我国仅为2203亿美元,日本高出我们4倍多。20年的历史足以证明,“左”的思想根子很深,时间很长,影响深广,危害极大。考察这一段历史,我们对于邓小平用“根深蒂固”来形容“左”的思想就会有更深的领会。“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为全党全国人民敲响的振聋发聩的警钟。其二是可以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党在“左”倾阴影下徘徊的局面;结束了“文革”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根本消除了1958年以来“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结束过去20年中的失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成为实现党的历史上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飞跃的新起点。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了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中“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才能深切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束缚是何等地来之不易,才能深切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6年取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果是多么地值得珍惜。

三、要科学分析“20年”

党对“文革”十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是全盘否定的。邓小平提出“耽误了20年”,好像是把“文革”十年同“文革”前八年和后两年相提并论,其实真正用意是使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左”的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不意味着要对“20年”进行全盘否定。对“20年”要做科学具体地分析,总的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58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这一时期同“文革”有质的不同,不能简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党在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有两种发展趋向,一方面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特别是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们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些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左”的错误在逐步发展,经济建设上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典型,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愈来愈严重,发展到“文革”前夕的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四清”运动,就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曾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正式宣布。”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既不能把它等同于“文革”而加以全盘否定,又不能割断它同“文革”的历史联系,低估“左”的错误的发展。(二)十年“文革”时期。“文革”是“左”的错误恶性发展的产物。“文革”十年中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始终在中央占支配地位。对于“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应予全盘否定,既不能“三七开”,也不能机械地“一分为二”,更不能如有的人那样去竭力发掘“文革”发动的所谓“合理动机”。(三)“文革”后两年。这两年和“文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结束了十年动乱,党的各项工作有所进展。但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推行“两个凡是”,“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有的还有所发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总的来看,正如邓小平所说,由于“左”的干扰,社会主义事业在1958年至1978年间整整耽误了20年。其中“文革”十年是“左”倾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文革”之前,“左”有量变的积累,“文革”之后,“左”有自然的延伸,对不同时期应科学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王 文)

1958 ~ 1978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际比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远远超过旧中国的水平,而且也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是,我们在看到进步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与国际间的经济差距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严重存在。实事求是地认识进步与差距,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制定发展战略,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40年来,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如果把40年的历程分阶段来考察,从1950年到1957年的最初8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这两个阶段,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是很快的;然而,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发展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近几年来,邓小平曾多次对1958~197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作过概括性的论断:

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20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

从1957年到1978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2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但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那段时间,农民年均现金收入60元,城市职工月均收入60元。在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变化,按照国际标准,一直处在贫困线以下。

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这20年中,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力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

这些大致相同的论断,深刻揭示了1958~1978年我国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停滞不是停止,还有发展,但发展十分缓慢。我国经济发展滞缓的20年间,世界经济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起飞或进入高速增长,如日本、西德的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非洲“象牙海岸奇迹”,南美的“经济慧星”巴西等。40年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济差距经历了缩小(新中国成立后头8年)、拉大(1958~1978年)、再缩小(改革开放的十年)这样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全面和准确地评估 1958~1978 年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成绩,不能不与新中国成立后头 8 年和改革开放 10 年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也不能不与同期世界发展水平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通过双向比较,明确自己的成就与不足,了解我国在国际大赛场上的进步与差距。本文拟就这 20 年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作一比较分析。

历史的比较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虽然增长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低效益往往是过高速度的伴生物,但是,以增长率来衡量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58 年以后的 20 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停滞不前,并出现三次负数增长。第一次负增长发生在“大跃进”之后的 1959 年到 1962 年。与上一年相比,农业在 1959 年下降 13.6%,1960 年下降 12.6%,1961 年下降 2.4%;工业在 1961 年下降 38.2%,1962 年下降 16.6%;国民收入在 1960 年下降 1.4%,1961 年下降 29.7%,1962 年下降 6.5%。“二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仅增长 0.6%,其中工业年均增长 3.8%,农业年均下降 4.3%;国民收入年均下降 3.1%。随后,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1963—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15.7%,国民收入年均递增 14.7%,1965 年大体达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 1962 年的指标。可惜,当我国经济刚刚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时,1966 年开始又陷入长达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 9.6%,1968 年又下降 4.2%;国民收入比 1966 年下降 7.2%,1968 年又下降 6.5%;钢产量比 1966 年减产 32.8%,1968 年又减产 12.1%。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第二次负增长。1969 年到 1973 年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74 年又出现了停滞,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一年增长 1.4%,国民收入只增长 1.1%,钢产量减产 16.3%。1975 年稍有好转,1976 年又急剧下降,国民收入和工农业净产值分别下降 2.7%、3.7% 和 2%,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第三次负增长。总的来看,“文革”十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7.1%,人均国民收入年均递增 2% 多一点。新增国民收入大部分用来抵偿新增人口的消费。

1958~1978 年 20 年累计,我国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为 7.1%;工农业总产值为 7.6%;国民收入为 5.3%。

与新中国成立后头 8 年和改革开放 10 年相比,这 20 年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下述三个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党史前篇

一是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即到1957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快的。恢复时期的1949~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1.1%。当然,这三年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样高的增长速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6%。8年累计,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2%。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旧中国所不可能有的,也是1958年以后20年间所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更快。1988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由3588亿元增加到1401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每年平均增长9.6%,大大高于前20年(1958~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5.7%的速度。这一速度已经赶上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起飞速度(香港9.1%,南朝鲜9.7%,新加坡8%,台湾省5.24%)。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182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2.8%,不但快于前26年平均每年增长11.4%的速度,而且还具有生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的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六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农业总产值从1953年到1978年26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2.7%,其中“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4.5%，“五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3.2%，而“六五”时期则达到8.1%。改革开放10年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2%,大大高于前20年平均每年增长2.3%的速度。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10年,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时期。

二是增长速度极不稳定,呈现为大起大落、陡升陡降的不正常状态。这一时期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只要经济形势稍一好转和初步稳定,就开始酝酿新的冒进,冒进发展到顶峰,又不得不以巨大的代价进行调整。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78年的“洋跃进”,每一次都以被迫的调整作为发展的一个休止符。由于经济建设中不断出现“好转—冒进—失调—调整”的循环过程,阶段之间甚至年度之间发展速度大起大落,1958~1962年经济增长偏离平均速度的最高偏离值是+24.8%和-41.4%,波幅达66.2个百分点,接近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的波动幅度(70%)。从长远看,有较高的统计速度,但实际上是原有经济水平的曲折反复或低水平的经济增长。

三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偏差。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同统计数字所表示的增长速度是不相称的。说明这一时期增长速度不够实在,水份较多,效益较差。总体来看,1958~1978年20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了“上一下一上一下”的曲折过程,发展缓慢,波动较大。

(二)经济效益的比较

我国在“一五”时期,不仅取得了较高的、较稳定的增长速度,而且也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可是,1958年以后的20年间,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一条重产值产量发展速度、忽视生产建设经济效益的错误道路,不仅发展速度大起大落,而且经济效益也出现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明显的下降趋势。投入不断增加,产出日趋减少,是这个时期十分突出的问题。

首先,从全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指标来看,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 35 元,“二五”时期下降为 1 元,1963~1965 年增至 57 元,“三五”、“四五”又分别下降到 26 元和 16 元;社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所占比重,“一五”时期平均为 44.3%，“三五”、“四五”时期分别增加到 48.1% 和 51.8%。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每一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年平均增长 6.3%,1963~1965 年为 11.4%，“三五”、“四五”时期分别下降到 4.4% 和 3.2%。1958~1978 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十年是下降的,其中“二五”时期平均每年下降 5.4%，“四五”时期平均每年下降 0.3%;同一时期,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减少了 24%。

其次,从工业生产来看,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1957 年为 23.8 元,1965 年为 20.9 元,1978 年为 15.9 元,21 年减少 33.2%;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1957 年为 34.8 元,1965 年为 29.8 元,1978 年为 24.2 元,21 年减少 30.2%;每百元工业产值实现的利润,1957 年为 17.1 元,1965 年为 21.3 元,1978 年为 15.5 元,21 年减少 9.4%。这大致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

第三,从基本建设来看,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五”时期为 83.7%，“二五”时期下降到 71.4%,1963~1965 年上升到 87.1%，“三五”、“四五”时期又分别下降到 59.5% 和 61.4%;建设周期逐步延长,“一五”时期为 6.5 年,“二五”时期为 12.4 年,1963~1965 年为 9.7 年,“三五”、“四五”时期分别达到 8.8 年和 10.7 年,1976(17.5 年)比 1957 年(3.8 年)延长 13.7 年;基本建设工程造价不断增加,“二五”时期与 1976~1978 年相比,每吨钢的综合投资由 1360 元增加到 3497 元,每吨煤的综合投资由 56 元增加到 179 元,每枚棉纺锭的综合投资由 684 元增加到 1250 元。

第四,从商业来看,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由 1957 年的 20 元,下降到 1976 年的 9.7 元;流动资金周转慢,1976 年为 1.88 次,比历史较好水平的 1957 年的 2.21 次慢 0.33 次。

从整体看,1958~1978 年 20 年间,除三年调整时期外,大多数年份的经济效益都很不理想。高投入与低产出的悖反并存,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资金、能源以及人力的高投入取得的。经济效益的下降,意味着人民付出的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和收入大大减少了。以“大跃进”和“文革”为例,两次折腾共损失国民收入 6200 亿元,而 1958~1978 年 2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仅 5627.76 亿元,1982 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 6258.8 亿元,也就是说损失浪费的钱比 20 年全部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得多!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 33 年全国的家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由于 1958 年以后的 20 年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因而,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前 20 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6 年与 1978 年相比,能源产值率提高 41%,劳动效率提高 57.6%(这两项指标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0.3%和 -1.8%)。另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我国全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入与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城乡平均消费水平增长的对比关系,按可比价格计算,1958~1978 年平均分别为 1:0.77,1:0.58,1:0.2;1979~1986 年平均分别为 1:1.29,1:1.1,1:1.03。这表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整体效益,改革后比改革前有了较大提高。但是,总起来看,我国目前的经济效益还很不理想,有些指标尚未达到“一五”时期最好水平。在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还需更加努力。

(三)国内外贸易的比较

国内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1978 年 20 年间,国内贸易发展缓慢。1978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1558.6 亿元,比 1958 年的 548 亿元增长 1.8 倍,平均每年只增长 5.4%。1953~1960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以每年 12.2%的速度大幅度地增长。但 1960 年以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有所下降,到 1964 年才恢复到 1959 年的水平。1966 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 6.2%,大大低于“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 11.4%和改革开放 10 年平均每年增长 16.9%的速度。1978 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商品生产发展缓慢,改革开放 10 年来农村商品零售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波动很大。外贸在 50 年代迅速扩大,1950~1959 年,我国出口贸易额按平均每年 17%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同期世界出口额 6.7%的平均增长水平。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 1952 年的 1.1%上升到 2.2%。60 年代初,伴随着“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衰退,外贸也随之萎缩,出口额从 1959 年的 22.6 亿美元下降到 1962 年的 14.9 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降到 1.1%。到 1965 年,出口贸易额才又恢复到 22.3 亿美元。“文革”开始后,对外贸易再一次衰落。1967~1970 年,外贸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1971 年,进出口贸易才又开始有所增长。“文革”10 年间,出口额每年增长 10.8%,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每年平均增长 16.4%的速度,占世界的比重也由 1961 年的 1.2%下降到 1976 年的 0.7%。1978 年到 1958 年相比,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38.7 亿美元增加到 207 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 8.7%,大大低于新中国成立后头 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6.6%和改革开放 10 年平均每年增长 17.4%的速度。近 10 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据海关统计,1981 年以来,进出口总额每年都超过 400 亿美元,1988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经济合作项目,也有较快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加强,对促进国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民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比较

一个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及其改善程度,是衡量该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指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头8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不慢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一五”时期又提高了42.8%,年平均工资从1952年的446元增加到1957年的637元。农民的收入在三年恢复时期增长了30%以上,“一五”时期又增长了将近30%,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3.8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增长66.7%。

但是,从1958年开始出现问题,此后的2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善,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下降了。(1)工资方面。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1957年为637元,到1976年下降到605元。1977年部分职工提高了工资,到1978年才使职工年平均工资上升到644元,21年只增加7元,平均每年增长0.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每年下降0.6%。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57年为73元,直到1978年仅为134元,平均每年增长2.9%(未扣除价格因素)。到70年代末全国还约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农民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过着“吃饭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活。(2)主要生活消费品方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57年为102元,1978年为175元,平均每年增长2.6%,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8%。20年间,由于生产发展缓慢而人口增长迅猛,几种主要生活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逐渐减少。例如,粮食,1978年为390.9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409斤低18.1斤(20年间粮食只增加10477万吨,而同期人口净增3亿以上);棉布,1978年为24.1尺,比最高的1959年的29.2尺低5.1尺;食用植物油,1978年为3.2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5.1斤低1.9斤。这个时期,很多消费品和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3)住房方面。20年间,在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中,住宅建设投资在“二五”时期占4.1%,三年调整时期占6.9%，“三五”时期占4%，“四五”时期占5.7%，比“一五”时期占9.1%的比例相差甚远。由于居民住房建设很少,满足不了新增人口的需要,所以人均住房面积有所下降。据1978年调查,全国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还少0.9平方米。1977年我国城市缺房户约占城市总户数的37%。与世界各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相比差距更为明显,1978年日本为13平方米,南斯拉夫为15平方米,苏联为12.5平方米。

改革开放1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4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提高11.8%;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11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87%,平均每年增长6.5%。消费品人均消费量,1988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由195.5公斤提高到249.1公斤;棉布由24.1尺